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以“两个结合”为线索的深圳文化发展之路

陈新华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深圳文化建设则是这一思想的时代注脚，同时也是这一思想体系背后实践的支撑。过往40余年，深圳以自己的改革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范例，其意义不仅在制度，更在文化。正是遵循“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发展理念，深圳才得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由此而开辟了一条建设新文化的路，回应了中华文化如何在现代新生的时代命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深圳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5-0009-07

若由文明史的线索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清晰可见的轨迹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的启蒙话语推动人类社会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西方“现代文明”相应成为唯一“完成式”的现代型文明^[1]。

然而，“唯一完成”并不代表就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最终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从理论的层面而言，“两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解构了以西方文明定义现代化的

唯一路径，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样式以及更丰富的可能性，成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要义。在实践的层面，这一理论的背后则有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支撑，为论证。而这其中，深圳经验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以自己的先锋探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样板，其意义不仅在制度，更在文化。不同于外界对深圳以GDP为引领的刻板印象，深圳经验，更是基于观念与文化的创新。实际上，正是遵循了“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发展理念，

深圳才得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由此而开辟了一条建设新文化的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一、深圳之“圳”:古今中西之间的融合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文化始终是最深沉、最持久、最根本的力量;这一力量的集中表达,则在于城市。正如英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其基本的功能就在于出生文化,流转文化,创造文化^[3]。看不见的文化与主义,正是以看得见的城市实践为载体而传播、吸收、提炼、升华。这也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而存在的根本意义。只有站在文化的视角,从文化的切面入手,才更能呈现这座城市的价值观念,体现这座城市之所以从无到有,短短数十年间屡屡创造奇迹的内在发展逻辑。

“圳”,本为广东方言,指田野间的水沟。深圳,则是深深的水沟。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块被赋予使命也被寄予期望的土地,从此开始强力推动经济特区内的城市化,走上一条世界上最快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转型之路。

物理的、地理意义上的田野沟壑被填平。与此同时,对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之外更广大的个体而言,一边是循环往复的历史因袭,一边是前所未闻的创新与变革,“深圳”两个字所构成的人的空间、文化意义的空间,既内涵着前所未有的“开放、现代、自由、多元、包容……”^[4],也意味着不断的碰撞和冲突,形成一种巨大的“观念的鸿沟”。

这一鸿沟,来自晚清以降所遭逢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如果从历史的高空俯瞰深圳,不难发现,这座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其安身立命,实际上是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从文化的意义而言,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自秦以来就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古老的从来没有断流

过的轴心文明,统一的文字、历法、宗教、价值观、生活习惯,涵养了国人强大的自我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多元而统一的文化体系。在这一稳定的体系下,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传统中变”^[5],治乱兴衰,不过王朝的代谢更替,中华文明从未衰落。然而,行至晚清,这一体系却在近百年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陷入深重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6]。至此,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巨变的主轴,与此对应,应对西方冲击,引进西学,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成为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主线。这个过程是全民族不断反思、集体试错的过程,它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文化,层层深入、层层反思、层层重建的探索。这一过程,毛泽东将之总结为“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然而,“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7]。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追问,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8]?这个问题“不是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而是东方文化的生死”,是“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是否还存在的问题”^[9]。

由西潮带来的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绵延至1910年代,得到了文化层面的重整与回应。以十月革命为契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将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的民族传统相结合,这才扼制住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运,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从时间的维度而言,1949年建立起来的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和古典时期的中国乃至近代的中国都不相同。这个“新中国”“新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诠释,就是“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它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0]。

这里的“新文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客观而言，是数千年来来的古典传统，近百年来中国革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共同“重构了”当代中国。也只有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复杂性，推动这三者之间的互为启发，彼此融合，才有可能打开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实现毛泽东理想中的“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这正是深圳立市所面临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深圳的位置，既在古与今与未来的时间维度里，也在世界和中国的空间维度中。她虽起于发展经济，要回答的却是晚清以来遭逢的传统秩序瓦解、重建文化认同、寻找文化出路的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如何走现代化之路的问题。“任何民族，都有它自己长程发展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中国自己发展“中国特色”，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免的^[11]。深圳所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正是为了终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西方思想盲从盲信的趋向，建立一种能够超克“现代性危机”，有自己独立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终回应民族复兴、中华文化新生的时代大课题。

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下的诞生，使得深圳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它的起与兴，皆出于文化层面的观念意义的革新，过程中又不断面临观念的冲击与冲撞，以及伴随一路的对特区正当性的质疑。深圳之“圳”，究其实质，是如何跨越中与西，新与旧，古与今，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对此，深圳的方式是，以一种观念和文化意义的联结，跨越鸿沟，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进程因为无所参照，没有成例，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便天然成为深圳的指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于是也成为深圳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成为深圳的实践。

二、深圳之“文”：以“两个结合”为联结的文化构建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决意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

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2]。他坚持由实践出发通往人、自然、社会、文化，认为一切的理论乃至现实问题，只有付诸实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合理的阐释与解决。由此，马克思将自己的学说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研究。

深圳的经验同样起步于实证。作为完全依托改革、政策而生，以经济特区形式出现的一座城市，深圳从一诞生，就具有了现代化城市的特质。在前行的道路中，因为没有传统的负重，它得以轻装上阵，杀出一条血路。但与此同时，从诞生以来就面对中与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对冲，也让深圳的文化自觉格外艰难。相对比其他城市早已成熟的文化形态，在困境和挑战当中“试”与“闯”的深圳，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引领，构建自己的文化形象，提升自己的文化认同。从1980年代诞生起一直绵延至1990年代初期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颜色之争，到1990年代中期“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再到“文化沙漠”的认同之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种争议面前，在历史的各个关键性的瞬间，它无一例外选择抛开过度思辨化的道路，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风格，实证的态度，改变世界，创造世界，在实现了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向深入。

深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1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问题，是想在一块试验田上，检验创新的思想与实践是否可行。为此，初代的建设者们摒弃了旧有的循规蹈矩，他们秉持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精神，敢闯敢干，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初步形成引领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由此扎下深圳文化发展的根脉，涵养了深圳文化的内在性格与外在表达。

特区文化建设其实是与经济建设同步开展的。1980年特区创建伊始，邓小平就提出，没有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果断提出一手抓改

革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两手抓”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个核心要义就在于，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们所创造并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与物质生产相互联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具备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没有物质，则没有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不证自明的道理，在马克思的年代，却是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它最终促成了欧洲大陆文化思想的重要变革。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深圳经济特区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最大的价值所在，从根本上而言，深圳的诞生与发展，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更是文化层面的破冰与重启。

面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发生的价值冲突，深圳的原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敢地肯定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正常追求。面对国门打开后不断涌入的西方思想文化，深圳的态度是“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思想解放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成为深圳文化的深层内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石破天惊的新思想突破了旧观念，重新定义了发展，“蛇口风波”推动对个人正当利益追求的合法性，文化市场和大众文化的出现，带来了歌舞娱乐、文化旅游等新兴文化需求，为深圳文化厚植了世俗社会、大众文化的土壤，凡此种种，皆为深圳日后的文化繁荣种下了种子。

深圳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2年。这一时期，特区文化在巨大的争议中向着先进的方向前进。在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在国内，对经济特区的非议之声仍未停止。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充分肯定了深圳靠闯“禁区”、跨“雷池”推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深圳以自己特有的

改革敏感，从实践出发的理论嗅觉，及时而准确地捕捉到改革的信号，撰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猴年八评”“八论敢闯”等一系列理论评论文章，既为改革助威，也为自身、为时代立言。在当时，“其影响决不仅仅在深圳，实际上是为中国整体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造了一种声势”^[13]，引领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舆论。从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再聚焦到深圳自身，回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则这一系列的文章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层面的意义，其本质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念、立场出发，悬置了古今中西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从而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深圳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与广阔的空间^[14]。

在此背景下，深圳“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关于‘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思想，围绕深圳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提出“现代文化名城”的目标，“建设现代文化名城，就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城市文化”^[15]。因为“只有立足‘三个面向’的高起点，才能形成文化规划的大视野、大思路和大手笔”。这一构想，再次彰显了深圳在理论层面乃至更宏大的文化层面的“野心”，这座年轻的城市，对自己的预期，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带头，还是文化上的引领——它是以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要求自己，期望以自己的文化实践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此进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走向深入，甚至于，探索出属于中国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的文化形态。从中也可看出，这座一度深陷“文化沙漠”困境的城市，从文化自觉的省察中，找到了面对未来的文化依据。

深圳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3—2011年。这一时期的特区文化在科学发展中寻求突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时的深圳正处于“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文化层面，作为移民城市，人们缺乏城市认同感、归属感。

文化人才、文化设施、文化氛围的缺乏,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认为城市竞争最终决战在文化,“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并提出“文化经济”理念。2005年,又进一步提出将文化产业作为深圳的第四大支柱产业。“文化立市”战略的确立,使深圳抓住了21世纪全球文化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从而得以在文化经济为驱动的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而“创新驱动发展,文化驱动创新”的理念,又使深圳将创新与文化结合,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010年,深圳将30年城市精神发展史浓缩升华为“十大观念”,由此形成了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观。“‘深圳观念’表达了深圳人对深圳的认知、理解和期待,反映了特区的品格特征,塑造了深圳的形象和深圳的集体人格特征,强化了深圳的城市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是深圳的精神图腾和价值符号……也是世界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指标。”^[16]至此,深圳再次证明了自己文化层面的特殊意义——相对比中国其他城市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联结,因改革开放而生的深圳,更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将四面八方、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力量。“十大观念”的形成也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深圳实际、中国实际,与中国本土传统的结合,已经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生活领域,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形式,潜移默化,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价值观念。

深圳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自2012年始,至今仍在进行时中。这一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文化的意义,文化的力量也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不断被光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更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18]。

在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深圳的发展亦呈现出“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再也不是发展初期被质疑为“文化沙漠”的困境,从“文化立市”到“文化强市”,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到全球标杆城市,乃至具有世界级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这座城市对自己的自我规划、未来想象,无一不是朝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向,无一不是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路径。

正是因为将自身的命运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深圳文化也在不断创新、传承与发展中繁荣壮大,连续六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瞩目的新兴文化力量。

三、深圳示范:面向未来的文化复兴

梳理回顾深圳的文化之路可以清晰得见,这座城市的文化形态,天然禀赋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也始终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正是因为一种先天的基因与历史进程,赋予了深圳样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19]。

不同于其他城市循序渐进的历史积累,这座“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它的文化,先涵养于观念的突破,后则成型于观念的创新。在“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进程中,是观念的力量,将四面八方的外来移民聚拢在这个以深圳为名的时空里,形成一个超越地缘、血缘意义的观念的共同体。在“探出一条新路”的改革进程中,是这个以深圳为名的观念的共同体,

齐心协力，用改革推动改革，回应了一系列的时代大命题，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发展的奇迹。这个文化奇迹，来自1980年代将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用于文化建设的“勒紧裤腰带也要办文化”的魄力。来自1990年代顶住“文化沙漠”的非议一心要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勇气。来自世纪之交力图以“文化立市”，建设高品位文化城市的远见。来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要让“文化强市”，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野心。来自2016年的《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打造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建设与现代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化强市的气魄。来自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的未来想象，以及“双区”驱动、“双区”叠加机遇下全球标杆城市的自我定位。

这条从时时反省、时时求索的文化自觉出发，寻找自己文化位置的路，深圳走得并不轻松，过程中或有曲折，或有困惑，或有迷茫，然而最终，都被这座城市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态度、实证的风格一一克服，从文化自觉一路走到文化自信。

深圳的文化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一理论体系提升到新的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0]。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华文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彼此契合，相生相长、互相成就。正是因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正是因为与实践现代性的进程中保持了民族性，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接纳了世界性，正是因为坚持了这种结合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才有了深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探索。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理论结晶^[21]，深圳文化建设则是这一思

想体系的注脚之一，也是这一思想体系背后的实践支撑。深圳用40余年的时间，以自己创造的世界城市历史与文明的奇迹，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引领力，回应了中华文化如何在现代新生的时代命题。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内在于、融汇于中华现代文明。

诚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世界里，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关于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它是关于我们生而为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关于我们如何通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正是深圳文化努力的方向。深圳的文化实践，是站在历史延长线上，坚守在中华文化立场之上，面向未来的文化复兴，是为了创建一种被认可、被称颂、被追随的价值观念、意义系统，是为了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赋予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属于深圳的，也属于中国的文化理想。

以此为方向，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深圳不断自我超越，如同城邦源头的雅典罗马，如同古代的长安、近代的伦敦纽约，输出理念，输出智慧，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阐述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方案，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金耀基. 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M]// 冯俊文主编. 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的学思历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7.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
- [3] 刘易斯·芒福德著. 城市文化 [M]. 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郑时龄，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xvii.
- [4] 毛少莹. 30年深圳文化发展历程研究 [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3）：19-23.
- [5] 罗志田.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

[6]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92.

[7]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M]// 毛泽东选集 (一卷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8: 1358-1360.

[8] 罗志田. 文化东西: 梁漱溟之间的时代性 [J]. 探索与争鸣, 2016, (7): 32-36+2.

[9] 梁漱溟. 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 [M]// 梁漱溟全集 (第1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261.

[10]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M]//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624.

[11] 陈新华. 许倬云访谈: 人生没到终局, 尽其在我 [M]// 冯俊文主编. 倬彼云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371.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6.

[13] 高兴烈, 王庭僚. 高奏改革开放主旋律——深圳商报记录、见证、推进改革开放纪实 [N]. 深圳商报, 2018-12-10.

[14] 王为理. 深港文化互动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J]. 学术研究, 2000, (12): 80-83.

[15] 深圳市委、市政府. 深圳市文化事业发展规划(1998-2000)三年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 [M]// 苏伟光. 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考.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9: 79-80.

[16] 王京生. 观念的力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6.

[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1.

[18][21] 傅华.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J]. 求是, 2023, (20).

[19] 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10-15(02).

[20]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

作者: 陈新华,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钟晓媚